

徐霞客研究

第6輯

鳳閣傳金縷地傍龍宮展貝多明月一塵心
却指車樊亦多
玉臺高擁翠芙蓉醉却虛空獨有宗鍾磬靜
中雲一壑蒲團悟後月千峯拈來萬草機
在探得珠采之重是自名山堪結習天華如
意落從容

江左霞客徐弘祖頌首具藁



徐霞客研究

第6辑

中国徐霞客研究会
江阴市人民政府 编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徐霞客研究(第6辑)/中国徐霞客研究会·江阴市
人民政府编.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4

ISBN7-5077-0190-5

I. 徐… II. 中… III. 徐霞客(1587~1641)-研究
IV. K82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6532 号

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万寿路西街 11 号 100036

高碑店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32 开本 7.25 印张 154 千字

2000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3000 册

定价:12.00 元

目 录

特稿

- 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张岱年(1)
- 21 世纪关于传统文化深入研究的几个问题 张岂之(10)
- 回顾过去 展望未来
- 在乔治·戴维森勒勋章授奖仪式上的发言 侯仁之(17)
- 迎接新世纪 更上一层楼
- 关于《徐霞客研究》办刊方针的
- 对话 江牧岳 方 宣(20)

专论

- 徐学的兴起是顺应中国文化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
- 《徐学概论》序一 任美镔(22)
- 徐学研究要有开拓创新精神
- 《徐学概论》序二 褚绍唐(24)
- 徐学游记的重要启示
- 《徐学概论》序三 陈桥驿(30)
- 浅谈徐霞客诗兼议考证王十岳 胡有萼(35)
- 现代旅游与《徐霞客游记》 冯乃康(47)
- 徐霞客与中国近、现代地学思想 白 电(70)
- 浙江白垩纪盆地的形成与丹霞地貌的崛起
- 兼谈徐霞客游丹霞地貌 陈良富(78)
- 徐霞客与江郎三月石 竺国强(85)
- 试论徐霞客与衢州古城 丁锡贤(89)

徐霞客的乐观性格和健康体质	郑祖安(95)
史料	
探险的实测的大地理学者——徐霞客	梁启超(110)
在筹备纪念徐霞客诞生四百周年座谈会上的	
发言	潘琪(117)
致瞿宁淑同志函	于光远(119)
文明夫人蔡玉卿	魏敬东(121)
《徐霞客游记》入选大学教材及其文学评价述略	汤家厚(127)
考证	
潘耒与《徐霞客游记》	黄明泉(138)
读《晴山堂石刻》丛札	冯岁平(143)
徐霞客与《重修智者广禅寺记》碑	包瑞田(154)
书林	
《盘县徐学研究论文集》序	朱惠荣(158)
《徐霞客在浙江》后记	石在 徐建春 陈良富(162)
《徐学概论》后记	朱钧侃 倪绍祥(164)
《'98 台州天台山徐霞客旅游文化研讨会文集》	
前言	陈幸均(168)
《小霞客游记》丛书出版笔谈	束沛德 高洪波等(170)
人物	
深切怀念谢筱迺同志	黄实(177)
交流	
'99 衢州一江山徐霞客旅游文化研讨会综述	徐建春(187)
不灭的履痕	
——2000 年“徐霞客与云南环保”活动侧记	郑千山(192)
诗文	
武夷风采	刘白羽(195)
诗三首	施光华(201)

长江源(日记片断).....	杨欣(203)
后记.....	编者(218)
英文要目.....	(220)

特 稿

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张岱年

此文转载自老品、王平编，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散文精品》一书。

——编者

中国文化即是中华民族的文化。

中华民族是由许多民族(或称为种族)共同构成的一个整体。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各族的文化相互交融,共同构成为丰富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

从历史来看,不能不承认,汉族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汉族文化经常对于各兄弟民族的文化施发影响,而且吸收了各兄弟民族的文化成就,彼此之间有一个长期的相互交融的过程。

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文化是一个独立发展的体系,有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常吸收外来文化的长处,但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因而成为世界上一个独特的文化类型,而且影响于国外,对于世界文化作出过巨大的贡献。

中国文化在几千年中,巍然独立,存在于世界东方,除了有一定的物质基础(物质生产的原因)之外,也还有其一定的思想基础。

中国文化长期发展的思想基础,可以叫做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何谓精神?精神本是对形体而言,文化的基本精神应该是对文化的具体表现而言。就字源来讲,精是细微之义,神是能动的作用之义。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精微的内在动力,也即是指导民族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

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曾经指出:“还必须注意到结合成一个民族的人们在精神形态上的特点。各个民族之所以不同,不仅在于它们的生活条件不同,而且在于表现在民族文化特点上的精神形态不同”^①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也就是中华民族在精神形态上的基本特点。

近代以来,由于中国受帝国主义的欺凌,由于反动统治者的腐败无能,由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人们特别注意考察中国旧有的思想意识中的消极衰朽的方面,注意考察旧有思想意识中的陈腐萎靡的病态。这是必要的。对于这些不正常的病态,必须有清醒的认为,有改革的决心。但是,如果中国文化仅仅是一些病态的堆积,那末中华民族只有衰亡之一途了。这正是一些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的诅咒。而我们现在,却更要注意考察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积极的健康的要素。

我们要深切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指导作用的推动历史前进的精神力量。

中国文化有五千年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又获得了新生,达到了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新阶段。中国文化能够历久不衰,虽衰复盛,这就证明,中国文化中一定有一些积极的具有生命力的精粹内容。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什么呢?指导中国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是什么呢?这里试举出四点:(1)刚健有力,(2)和与中,(3)崇德利用,(4)天人协调。我认为这些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所在。略说如下。

(1)刚健有为

《周易大传》提出“刚健”的学说。《彖传》说：“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又云：“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又云：“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这些都是赞扬“刚健”的品德。《说卦》云：“乾，健也；坤，顺也。”健是阳气的本性，顺是阴气的本性。在二者之中，阳健居于主导的地位。《象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体运行，永无已时，故称为健。健含有主动性、能动性以及刚强不屈之义。君子法天，故应自强不息。《周易大传》强调“刚健”，主张“自强不息”，这是有深刻意义的精粹思想。

从汉代到清代，二千年之中，《周易大传》被认为是孔子的著作，它是以孔子手著的名义发生影响的。所以，“自强不息”的思想在历史上曾对很多知识分子起过激励的作用。事实上，《周易大传》并非孔子所著，“刚健”之说应是战国时代儒家中讲《易》的学者提出来的。“刚健”虽不是孔子提出的，但孔了确实比较重视“刚”。《论语》记载：“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枋。子曰：枋也欲，焉得刚？”（《公冶长》）郑玄注云：“刚谓强志不屈挠。”《论语》又载孔子云：“刚毅木讷近仁。”（《子路》）可见孔子肯定“刚”是有价值的品德。《周易大传》的刚健之说实渊源于孔子。

孟子鄙视“以顺为正”，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生活准则。《孟子》书载“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也；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汝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大丈夫应有独立的人格，遵守一定的准则，不屈服于外的压力。孟子这种见解与《周易大传》的刚健

思想有一致之处。

孔子重“刚”，老子则贵“柔”，两说相反，都有深远的影响。老子提出“无为”论，孔子也尝赞美无为的政治，但孔子认为日常生活中应该有为。他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阳货》）孔子自称“为之不厌，诲人不倦”（《述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同上），他坚决主张有所作为，表现了“自强不息”的精神。

宋代周敦颐受道家影响，提出“主静”之说，在宋明时代，影响很大。到明清之际，王夫之重新肯定了《周易大传》的刚健学说。王夫之说：“圣人尽人道而合天道。合天德者，健以存生之理；尽人道者，动以顺生之几。”（《周易外传》无妄）又说：“惟君子积刚以固其德，而不懈于动。”（《周易内传》大壮）王夫之有力地宣扬了“健”和“动”。

《周易大传》关于“刚健”和“自强不息”的思想在实际上了起了推动中国文化向前发展的积极作用。而道家和部分宋儒的“柔静”学说则是“刚健”思想的一种补充，两者相互对峙，相互引发，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面貌。

（2）和与中

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有所谓“和同”之辨。“同”是简单的同一；“和”是众多不同事物之间的谐和。《国语·郑语》记载西周末年史伯的言论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史伯区别“和”与“同”，“以他平他谓之和”，意谓聚集不同的事物而得其平衡，叫作和，这样就能产生新事物。所以说“和实生物”；“以同裨同”，即把相同的事物加起来，那是不能产生新事物的。《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晏子论和同的区别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燔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于食之，以平其

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这所谓和也是聚集不同的事物而得其平衡。君臣之间，臣能提出不同的意见，君能容纳不同的意见，然后可称为和。史伯、晏子关于和同的思想，一是要求多样，二是要求平衡。这是一种促进文化发展的思想。

孔子也区别了和与同，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看来孔子是同意晏子关于和同区别的言论的。孔子对于和同之辨未多讲，而提出了“中庸”的观念。后来孔子之孙子思作《中庸篇》，对于中庸观念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于是中庸观念在中国文化史上发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由于后来的思想家对于中庸有不同的理解，因而中庸观念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也不是单纯的。

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对于中庸的含义未加说明。《中庸篇》云：“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又云：“舜其大知也与，……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这里以“时中”、“用中”来解说中庸，时中即随时处中，依条件的不同随时选取适当的标准。用中即不陷于某一极端，随情况的不同而确定适当的方法。

从汉至宋，经学家对于中庸有不同解释。郑玄诠释《中庸篇》的题义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礼记疏》引《郑目录》）这是认为中庸指中的运用。程颐诠释中庸云：“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朱熹《中庸章句》引）这是把中庸看成固定的原则。郑玄的解释是比较符合原意的。

中庸思想的主要涵义是：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对于实现一定的目的来说，有一个一定的标准，达到这个标准就可以实现这个目

的,否则就不可能实现这个目的。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叫作不及,超过了这个标准叫作过。如果超过了这个标准,就不可能实现原来的目的,而转变到原来目的的反面。所谓“中庸之为德”,就是经常遵守一定的标准,既不过,亦不是不及。这是中庸的品德。有些事情,确有一个适当的标准,例如饮食卫生一类的事情,确有一个适度的问题,这个度在过与不及之间。但是社会的变革,在一定条件下,需要打破原来的标准,才能取得更大的发展;如果固守原来的标准,就会陷于停滞不前了。中庸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上有两方面的作用。第一,保证了民族文化发展的稳定性,反对过度的破坏活动,使文化发展不致中断;第二,对于根本性的变革又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3)崇德利用

春秋时代有“三事”之说,《左传》文公七年记载晋国贵族郤缺的言论说:“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正德,端正品德;利用,便利器用;(用指工具器物之类。)厚生,丰富生活。正德是提高精神生活,利用厚生是提高物质生活。《左传》成公十六年记载楚国申叔时之言云:“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节。”又襄公二十八年记齐国晏婴之言云:“夫民,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生活丰厚,器用便利,然后端正德行加以节制。幅是节制之义。晋、楚、齐三国的贵族都谈到正德利用厚生,可见这是当时比较流行的思想。“三事”之说兼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是比较全面的观点。

《周易大传》中讲到“崇德”与“利用”的关系问题,《系辞下传》说:“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朱熹《本义》解释说:“精研其义,至于入神,……然乃所以为出而致用之本;利用施用,无适不安,……然乃所以为人而崇德之资。……至于穷神知化,乃德盛仁熟而自致耳。”)义指事物的规律,神指微妙的变化。精研事物的规律,以至于理解深微的变化,是为了实用;便利实际运用,是为了提高道

德。而道德提高了,就更能对于微妙的变化有更深入的理解了;《周易大传》既重“崇德”,又重“利用”,也是比较全面的观点。

春秋时代的“三事”之说,兼重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是比较全面的正确观点。儒家特重“正德”、“崇德”,对于“利用”、“厚生”的问题研究得不多。道家反对“利用”,也不赞同“厚生”,对于文化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但历代都有一些自然科学家,对于“利用厚生”的实际问题进行过切实的研究,从而丰富了文化的发展。

“正德利用厚生”、“崇德利用”的思想,虽然在秦汉以后在理论上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挥,但确实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

(4)天人协调

天人关系问题,亦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根本问题,也是文化方向的基本问题。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三种学说。庄子主张因任自然,“不以人助天”(《庄子·大宗师》),“无以人灭天”(同上《秋水》)。荀子主张改造自然,“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而最重要的是《周易大传》的“辅相天地”的学说。《象传》说:“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所谓裁成辅相亦即加以调整辅助。《系辞上传》说:“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范围亦即裁成之义,曲成亦即辅相之义。《文言传》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此所谓先天即引导自然,此所谓后天即随顺自然。在自然变化未萌之先加以引导,在自然变化既成之后注意适应,做到天不违人,人亦不违天,即天人相互协调。这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理想,亦即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基本道路。《周易大传》在历史上是以孔子手著的名义发表影响的,所以这种天人协调的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上居于主导地位。

王夫之提出“相天”之说,他说:“语相天之大业,则必举而归之于圣人。……人弗敢以圣自尸,抑岂同禽鱼之化哉?……故无之所死,犹将生之;天之所愚,犹将哲之;天之所无,犹将有之;天之所乱,犹将治之。”(《续春秋左氏传博议》)传统的观点以为“相天”是圣人的大业,普通人虽非圣人,但也与禽鱼等动物有所不同。增加自然所没有的,改变自然所已有的,这是人的作用。王夫之的“相天”之说是古代“裁成辅相”天地的思想的发挥。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直至今日,仍然是必然认真对待的问题。近代西方强调克服自然,战胜自然,确实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如果不注意生态平衡,也会受到自然的惩罚。改造自然是必要的,破坏自然一定要自食苦果。中国传统的天人协调的观点确实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文化是受生产方式决定的。周秦至明清的文化基本上是封建文化。西方中世纪文化也是封建文化。中西的封建文化,彼此很不相同。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化确实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到了近代,中国文化,较之西方,却相形见绌,远远落后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确有消极的病态的一面,但也有积极的健康的一面。识别中国民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对于树立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是非常必要的。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还有一个维护民族独立、为“报国”而献身的优良传统。孔子称赞管仲,“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从此以后,维护民族的尊严、保卫民族的文化,便成为一个深根固蒂的信念。在历史上,汉族和少数民族有一个相互竞争、相互融合的过程,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在各族中,都有许多为国家为本族而献身的志士仁人,表现了复杂的情况。例如宋元之际,文天祥宁死不屈,发扬了民族的正气,起了激励人心的巨大作用。许衡把南宋的学术传播到北方,也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有重要意义。这都是不能用简单化的办法随意抹煞的。

中华民族还有一个善于吸收外来文化成就藉以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的优良传统。佛教的输入和流传,表明了中国人民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佛教在中国流传之后,一部分中国佛教徒把佛教教义中国化了,做出了自己的理论贡献;而儒家学者在批判佛教的过程中,充实了传统儒学的思想,提高了理论思维的水平,使中国的固有学术放出新的光彩。中华民族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又保持了自己文化的独立性,从而对于世界文化做出独特的贡献。

五四运动展开了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对于除旧布新,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历史进入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不但要批判封建文化,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我们的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不是凭空产生的。必须对于中外过去各时代的文化做出批判的总结,才能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一定要有中国的特点。清理传统文化的复杂内容,区别其中的精华和糟粕,肃清一切陈腐庸俗思想的流毒,充分认识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的文化遗产并加以改造提高,是我们今天的一项重要任务。

1982年9月8日

(本文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

注释

①《斯大林全集》第二卷第二九四页。

21 世纪关于传统文化深入研究的几个话题

张岂之

此文转载自《人民政协报》1999 年 6 月 16 日第四版学术家园专刊。

——编者

在本世纪,我国学者关于祖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即将来临的新世纪,这方面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必然会有更大的开拓。还有哪些属于宏观方面的课题需要作长期深入的研究?为抛砖引玉,我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中国文化起源问题

考古发掘以无可辩驳的材料说明,中国文明的起源并不是一个中心;黄河流域只是源头之一。我国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遗物向人们展示出异彩纷呈的文化形态。由此民族学家们研究中华民族的形成,提出“多元一体”论(见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国文明的起源亦可借用“多元一体”这个词。

研究中国文明起源,可以形成这样的观点:在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多元的文化形态相互影响吸收,共同形成中华民族“和而不同”的传统文化。“多元”则是中国文化得以连绵不断发展的原因之一,离开此就难以理解中华文化的底蕴。

早在本世纪初,学者王国维提出史学研究的二重证据法(见《古史新证》第一章《总论》),即以地下出土的资料如甲文、金文等证传世文献,又以文献证甲骨文、金文等新史料。学术研究实践证

明,二重证据法是科学方法论的一种。由此推广开来,关于文化的研究,文化史家、文化理论家等不一定同时是考古学家,但是有一点却是不容否定的,就是文化问题的研究(含研究当今文化的专家)都需要随时关注考古学成果,注意地下发掘成果的运用,阅读考古发掘报告,思考其中的历史文化意义,并与文献资料相参照。这种基本功,或者称之为人们日常的研究习惯,对于文化史家和文化理论家是不可缺少的。如果只是依据对于文献资料的爬梳,或者用传统的“解经”方式对文献资料的内容进行“复述”或“描述”,局限性太多,而且不易深化。借助于考古成果,其目的是为了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文化的特色及其历史演进。

研究 20 世纪人文科学(含文、史、哲和艺术)学术史

传统文化的研究需要有一个突破,从“描述”性发展到“分析”性;从“实证”性到“理论”性。为此就必须研究前人在此问题上的经验和不足。而学术史的研究恰好具有这样的功能。

学术史不同于政治史、法律史,也不同于思想史。顾名思义,学术史必须研究“学术”,而“学术”的载体主要是学术著作。因此,要求学术史研究并评论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以阐明它们在学术史上有什么地位与作用,以及对当代和后来有什么影响。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学术史不能不谈有代表性的学术大家,他们的出现总是和一定的时代条件相联系;这里所说的时代主要是指学科发展的历史时代。比如,当某一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如不革新,仍沿着老路走,就有可能萎缩。当它已有较丰富的资料和成果的积累,历史需要它向前推进,这个时候,学术大家便会应时而生。当然还有其它条件,如学术环境、学者自身的学养和经验等等。

不妨举个例子。本世纪初,西方某些哲学和史学流派传入,以